

從後發國家工業化的視角看百年思潮

曹錦清，文化縱橫，20150401，此為作者在「修遠書院菁英計劃--第二屆大學生暑期戰略研習班」上所做專場演講

坦率地說，我並不是很有資格談這個題目，應該是研究經濟史的人來講工業化的問題。但這個題目具有挑戰性。我把我不太成熟的思考先講一講，也求教於大家。

這個題目實在太大。“後發工業化”，誰是先發？嚴格地說，先發就是英國。英國是“自發”（或者“原發”）的工業化國家。其他的，比較英國，都可以說是“後發”。英國工業革命即將完成時，法、德、意、美等，要麼在革命，要麼面臨統一的任務。只有完成這些政治任務後，它們的工業化才逐步啟動。

如果我們籠統地把英、法、德、意、美看作第一波先發工業化國家，那麼所有非西方國家都可以說屬於後發工業化國家。後發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問題可以說是嵌入到整部世界近代史的大問題。我個人沒有這個能力處理這麼大的問題。在這裏，我主要結合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並以印度作為一個參照背景，談一談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幾個基本特徵，更為重要地是要談一談，如何從後發國家工業化的視角來看中國的近代史與思潮。

一、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幾個特徵

（一）“被”而能動

中國工業化的第一個特徵是“被”而能動。首先，中國是“被”工業化的。一句話，中國是被打入了近代。如果不被“打入”的話，按照多數學者的觀點，中國還在自己的王朝循環史中運動。它不太可能通過內部的力量、自己一步步地完成向近代化和工業化的轉軌。“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就是中國不能按照原有的軌道和秩序發展，被迫進行了“開放改革”。開放，是指對外開放；改革，是指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都必須適應開放的情形而進行改革。這與1978年之後主動性的“改革開放”正好是相對立的。

中國工業化的啟動是被動的。當然，“被”，而能動，就不錯。“被動”工業化啟動的時間大致可以確定為1865年江南製造局在這一年創立，太平天國運動也是在這一年處於潰敗。

洋務運動的領袖們，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對於工業化的啟動是有共識的：不買西方的產品，而是買機器，買製造產品的機器。中國“被而能動”的工業化之路，是從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開始的。我們甚至也可以說，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都從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起步。

（二）以軍事工業為先導

1、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冷兵器遭遇熱兵器

第二個特徵，中國的工業化是從軍事工業起步的。

在當時，最直觀的經驗就是武器不如人，戰場上一敗再敗。洋務運動的領袖們深刻意識到冷兵器對抗熱兵器的劣勢（這些詞是後來的詞，但認識是洋務派的認識）。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差不多是面對面的戰爭。箭和弩雖可遠距離攻擊，但最多也就200米內具有殺傷力。西方洋槍火炮可遠程射擊，還沒等你看見敵人，就已經被致於死地了。長矛大刀怎麼去應對堅船利炮？西方已經進入熱兵器時代，而中國仍使用冷兵器作戰；而且製造熱兵器的整個技術，中國無從知曉。恐懼是從這裏開始的。

所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在當時的具體意義就是中國人碰到了此前未曾見過的戰爭形態。之前的戰爭，多為北方農耕與游牧民族之間的對抗。漢族人在長城內外遇到的是騎在馬背上的敵人。在那之前，春秋戰國的中國人是在戰車上作戰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轉變為可以騎在馬背上作戰。這是中國文化史、軍事史以及政治史上的大事。

到了清末，更重大的變革出現了——冷兵器遭遇到熱兵器。恩格斯說過，火藥的發明和炮兵的形成，是整個歐洲封建制度壽終正寢的主要原因。沒有炮兵的話，歐洲封建主的城堡足以自衛；有了炮兵，摧毀城堡易如反掌。這時，中國人碰到的正是西方工業化以後的現代軍事裝備。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面對面的戰爭從此就變成了遠程戰爭。“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具體指的就是這個內容。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最重要、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正是因為問題之急迫，決定了中國不能像西方國家一樣從輕工業起步，而必須從軍事工業開始。

2、農-輕-重與重-輕-農

西方傳統的工業化道路，第一步是輕紡工業，是從容易機械生產的輕紡織業開始。

在英國最先突破的就是棉花紡織業。這個突破表現在英國完成了家庭手工業到工廠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過程。隨著海外擴張帶來的原料與市場的開拓，需要改進棉紡的方式。珍妮紡紗機應運而生，手紡變成機紡，一個人紡一支變成同時紡多支；紡紗技術提高之後，織布的技術也就需要提高。紡紗與織布率先機械化，這是工業化的第一步。而後，大約是在1763年左右，同類的機器組織在一起，工廠就建立起來。馬克思把工廠制度的形成看成是工業化的開始。工廠形成之後，首要的問題是動力從何而來？英國優勢在於，雨量豐沛、河流短促且數量較多，正好可以利用地勢落差形成水力，為機器提供動力。因而，起初英國的工廠只能建在有落差、能產生水能的地方，由水力帶動大機器。歐文的棉紡工廠就設在深山老林裏。用水作動力的話，工廠就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城市化。因而，對機器動力的需求推動瓦特發明了蒸汽機。1780年前後，蒸汽機進入紡織廠。蒸汽機作為新動力的代表，特點是方便移動，因而，工廠就可以在港口、尤其是在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選擇廠址。此類工廠集聚，就形成了現代工業城市。

傳統的城市一般來講是行政中心和軍事中心。比如，中國古代的“城”是行政中心，“鎮”是軍事中心，宋以後“城”、“鎮”兩詞模糊起來，可以合用。“城”裏有很多人消費，“市”大規模向城浸入，城、市逐漸合流。從宋代開始，破牆開店成為普遍現象——這就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情景。城市的消費，來源於直接的和間接的農業剩餘。它通過兩個渠道：或者是地主把地租帶到城市裏去消費，或者國家通過農業稅將財富集中在城內消費。這樣的城市的規模不可能太大。只有城市自身有生產力的時候，城市的規模才可能擴大。中國純商業的城市，據我所知是在明中葉以後，尤其是白銀資本進入之後。白銀大規模的輸入到中國，資本的流入促進了商業城市的發展。而現代城市一般是工業城市。工業城市則有工廠的集聚產業工人的集聚、工業資本的集聚及消費的集聚等。這是現代城市。也可以說，工業化推動了城市化。

輕紡工業的突破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工廠制度隨後擴展到其它生產領域，最終擴展到農業領域。其中的利弊我們先不討論。輕紡工業在英國的第一次突破確實是人類整個經濟史上的奇跡。這個奇跡在馬克思的敘述中是必然的。但現在很多人研究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偶然事件。首先，手工業轉化為製造業，如果完全依靠國內市場的話，一個製造業發展起來，相應的手工業就被摧毀，這就使得工業化必然依賴於廣闊的海外市場。在這個意義上，說工業化即全球化，一點沒錯。工業化必然伴隨全球化，伴隨著向外尋找原材料和拓展消費

市場。工業化必然依賴本國之外的更大的市場來滿足本國製造業的輸出需求。其次，工業化對於動力有著極高的要求。要用蒸汽動力，就要消耗木材，所以英國工業化初期的生態破壞是全面的。而英國又遇到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其煤炭埋藏淺，容易開採，煤炭資源很容易開，動力就解決了。在這些條件的綜合作用下，英國的工業化從輕紡工業起步，迅速過度到製造紡織機器的重工業，很快進入鋼鐵時代。重工業也包含了現代軍事工業的興起，推進了海外擴張，攫取海外的原材料、拓展更大的市場。

像英國這樣的先發工業國家，他們的順序是農業，到輕工業，然後到重工業。但是非西方國家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們面臨的是西方的殖民入侵，需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長技”指的就是軍事重工業，優先順序是重-輕-農。從重工業開始就面臨一個問題，大量的資本從哪里來？如果以輕工業為主，農民把棉花賣給企業，企業把布賣給農民，那輕工業的產品回到農村市場中去。當然，在資本介入的情況下，工業品和農產品有剪刀差，對工業有利，對農業有損。但輕紡工業還是可以通過市場在城市和農村構成一個循環的。如果跳過輕工業，直接開始重工業的話，那就只能從農村提取剩餘了。洋務運動一展開，就面臨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中國的“一五計劃”也面臨這個問題。能一直從農業去汲取嗎？它可持續嗎？

(三)國家主導

後發國家始於重工業的現代化面臨一個可否持續的問題。這直接導致了後發國家工業化的第三個特點：國家起著關鍵的作用。

1、日本與印度的經驗

英、法等先發國家如國的工業化是市場主導的。但這也不是像自由派經濟學家講的，政府越小越好，政府也是參與經濟活動的。越後發，政府的參與力度越大。比如，德、日。德、日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就很明顯。比如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走上了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道路，很快就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日本工業化的資金，最開始也主要來源於農民，提高農民的稅收，也就加重了農民負擔。有人統計過，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這些年，日本的農民起義一共有130多次。因而，日本也不能完全依靠搜刮農民來完成工業化。所以，日本從1874年開始入侵琉球，1884年又開始進攻臺灣。1895年，通過甲午戰爭，日本又從中國搞走了兩塊版圖——臺灣和朝鮮（朝鮮當時是中國的屬國）。日本把它們當作“次國土”來經營，對臺灣的開發力度就比較高。然後敲詐了2.3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清政府

一年財政收入的3倍，相當於當時日本財政收入的8倍。有了這筆白銀後，日本的現代化資金到位了，大量投資軍事工業。沒有這兩場戰爭，不會有日本的崛起，不會有日本的“脫亞入歐”。

這兩次冒險戰爭，對中國的影響反而也是正面的。甲午戰爭後，中國本來應該掀起反日情緒高漲，但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的憤怒情緒過去之後，緊接著就是向日本學習：小日本是怎麼把中國打敗的呢？因為日本是向西方學習的。那我們要學習日本成功的經驗。從1896年到1915年，尤其是戊戌變法之後的10年，中國掀起了學習日本的狂潮。

再看一下印度的情況。印度建國後，重要的戰略部門都是國營的，國營的成分很高，國營之外的還有私營部門，在農村建立的合作部，即三種經濟形式並存。1948年，《工業政策決議》將印度工業分為四大類：第一類軍工、原子能、鐵路，國營的。第二類，煤炭、鋼鐵、飛機、造船，主要是國營的。這兩類產業中原有的私營部門仍然保留，與原來的私營業主妥協，但新增的一律國有第三類，國家計劃管制的工業，像汽車業、拖拉機、機床、重化能源工業。三類之外，輕紡工業、小工業，可以私營，但有很嚴格的審批制度。當然這個佈局後來也出了很多問題。農村的農業、小手工業，建議走合作化組織道路。這條路根本沒有走通。這種經濟形態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中期。印度也是國家主導的發展戰略，也出現與中國類似的問題，難以持續、經濟失調。

2、為什麼從新民主主義跨越到社會主義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與印度有相似之處。中國原來的設想是走一段新民主主義道路，再進入社會主義。原來預期這個過程大概會有10年到15年。但為什麼後來這麼短，1953年就結束了？1950-1953年到底發生了什麼，讓中國急劇的地轉向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有幾條原因。

首先是新富農起來了，農村貧富分化開始。1950-1951年黨內有一個辯論，即土改後的重新分化論。共產黨最怕的就是分化。在今天，在最怕分化的共產黨的治下，30年來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了最為嚴重的貧富分化，這也是一個奇跡；而且，中國人大體還是接

受了這樣的現實，雖然部分左翼非常不滿。

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集中土地集中起來，加大對農業剩餘的提取，推動工業化。土改以後，把地主的七億畝土地分給農民，同時也把附著在土地上的地租也分給了農民。農民的生活是得到了改善。所

謂“改善”，就是以前以雜糧為主的、半饑餓的狀態，變成了現在稍微吃飽了一點，半個月或一個月可以多吃一次白饅。這多了的“白饅”，就是一部分原來的地主地租。

原來地主收取地租，自己消耗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作為商品糧提供給城市。現在把地分掉，就是把地租分掉，也是把商品糧分掉了。農民的生活改善了。城裏人的商品糧就銳減。當時城市需要多少糧食？大概700億斤。當時城裏糧食主要通過農業稅來徵收的。把土地分給農民了，農業稅就是比較重一點，農民也就接受了。當時大約在12%—15%之間，雖然已經很高了，還是比普遍地交給地主的的地租要低。

農業稅當時主要征實物——糧食。全國86%的土地是種糧食的，農業的主要產出是糧食。即使是1956年糧食生產較高的水平，糧食總產量超過了3000億斤，但是面對城市700億斤的需求，糧食稅缺口還差300億斤。有幾種方法：第一種，去農村搶。這一方式列寧採納過，在前蘇聯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方式實施過；這個在中國行不通。第二種是用錢買。但是當時就是以農業為主體，沒有錢收購。為了保證城市的糧、油、棉等的基本供給，就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在農業稅之外，進行統購統銷。統購統銷是一種隱蔽地將農業剩餘向城市、向工業輸送的渠道。這就是要搞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1950年的朝鮮戰爭後，對軍事現代化有著急迫的需求。經過這一次戰爭，共產黨痛感沒有軍事工業。雖然解放東北的時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軍工產業和技術人員，但總體上還是嚴重不足。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武器裝備基本上是在戰場上爭奪而來，沒有建立自己的軍工產業。有一首歌叫做“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句話說的不錯。假如共產黨的武器軍事裝備是自己製造的，必然要增加自己統治區的農民負擔，共產黨就無法在那樣的土地下生存。整個昂貴的武器裝備不在解放區生產，沒有增加解放區的負擔，再加上官兵比較一致，就是大家都過得比較清苦。這是共產黨在解放區生存下去的基礎性條件。而國民黨的武器裝備，一部分自己生產，一部分用錢買。錢哪里來？當然是搜刮來的。搜刮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直接搜刮，一種變相搜刮。抗戰以後，逃到重慶，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變相搜刮。抗戰中期以後，大量依賴于印鈔，通貨膨脹越來越大。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無力裝備一個昂貴的現代化軍隊。

中國自洋務運動開始的工業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軍事現代化的成本。現代化的第二個成本就是教育。過去讀四書五經，教育成本不高；儘管這樣，窮人家讀書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學問家戴震就依賴

宗族的幫襯。新式教育起來以後，尤其是1905年廢除科舉後，建立新的學校以後，教育就昂貴了，教材很昂貴、師資很昂貴、校舍也很昂貴。中小學校舍問題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廟宇、道觀徵用來做校舍。但是大學由國家組織，把學生輸送到新式學校，成本就很高。這些成本落到地富階層和工商階層的身上，這些階層的子孫就優先進入新式學校、優先留學。所以中國的這批現代知識分子的來源與這些階級有很大關係。這些學生畢業後由於沒有足夠的現代部門吸納他們，常常大量進入軍隊。新軍的中低級官員，大多和這些階層有很大關係了。

第四個因素是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和美國直接對陣，中國要發展現代工業，得到了蘇聯的幫助。1954年-1958年，赫魯曉夫執政，為了拉攏中國，蘇聯比較無私地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張柏春等寫的《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一書，很詳細地介紹了這段歷史。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很快結束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提出“一化三改”的口號。“一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小農業、改造手工業。這樣就廢除了私有經濟，建立起來全盤的公有經濟。公有經濟的實現兩種，一個是國有經濟，一個是集體經濟。1953—1956年全國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國的分散的小農被組織進各自的合作社（高級社）裏。這個變動史無前例。但其實對經濟影響不大，糧食產量還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澤東在山東北園鄉實地考察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之後，由於毛澤東的威望，人民公社化在全國掀起狂潮掀起。

我們講，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叫計劃經濟。這時的中國工業化徹底由國家主導。在二戰後獨立的其他許多國家，國家主導的能力有弱有強，但也都是由國家主導來推行工業化建設，包括“亞洲四小龍”裏的日本、韓國。

3、從“先強後富”到“先富後強”

國家主導，而非市場主導，是改革開放以後被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須要看到，國家主導是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重工業優先也可以表現為“先強後富”的道路。中國統一建國後的工業化有兩條路：如果外部國際環境和平，就走農、輕、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會好過一點；如果外部環境險惡，老百姓就得勒緊褲腰帶，就迫使中國走上重、輕、農道路。建國後，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關於這個問題有過一場大爭論。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一場農民

的革命、一場土地革命。農民把共產黨抬到北京，在北京執政，按道理應該讓農民休養生息才是，但是緊迫的工業化任務，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來。土地經過公社機制，實際上就是國有化了。我們是在國有化的土地上展開新一輪的工業化與新一輪的基礎建設。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與規模全世界獨一無二。沒有這麼大規模這麼快速度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沒有那麼大工業化速度全世界資本往這裏也是不可能。毛在爭論中所表達的觀點，本質是讓老百姓收緊褲腰帶，先有實力反擊侵略者，結束近代落後挨打的局面，然後再來解決老百姓的富裕問題。在毛看來，這叫大仁大義。

但毛澤東大約在1955年、1956年開始意識到重-輕-農的難以持續性。他寫《論十大關係》，就是想改變原來的戰略。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學基礎上，完成了從“革命辯證法”到“保守辯證法”的轉化，回到了傳統儒家的中庸辯證法。革命辯證法講兩點論、重點論和對立轉化論：，重點是強弱可以轉化，弱的可以變強，所以鬥爭是絕對的，轉化是絕對的，穩定是暫時的，平衡是暫時的。這就是《矛盾論》的基礎。對於一個處於被統治地位的革命黨，這樣講是有道理。但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表述不是這樣的。文中，毛澤東講以重工業為主並佔有絕對地位的，這是重點論；他繼續講：如果要發展重工業，那就要優先考慮農業和輕工業。顯然，重點論被悄悄轉移了，兩者要平衡。這種辯證法，我稱之為“保守辯證法”，事實上就是儒家辯證法——兩點論、重點論、平衡論。平衡有保守精神，維持事物的原狀而不是原事物向對立面轉化，就是防止革命。但可惜的是，當時這篇文章並沒有發表，代替它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右以後，毛又回到了革命的辯證法。

改革開放的特點是對這個戰略的激進調整。它以富裕優先、民生優先的戰略改變了“先強後富”的戰略，將發展重工業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民生建設為中心。不管怎麼說，沒有前三十年“重輕農”的積累，也就不會有後來“農輕重”的轉型。

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表現為把土地分到農民手中，然後快速提高農產品價格。當時糧食的收購價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銷售價格卻沒有變。所以，八十年代初農村裏出現了新景象，城市沒有什麼改變。這樣，國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億，等於是直接補給農民的，農民的日子當然好過些了。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隨著計劃生育的強化、農民負擔的增加，才演變為朝野關注的“三農”問題。

市場經濟改革後，對於前三十年由國家主導而非市場主導，批判最多。前三十年以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形式完成的國家主導，確實最為極

端。在批判的同時，首先要看到，前三十年要同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社會主義平等，本身就有矛盾；第二，國家主導的前三十年工業化為後三十年積累了基礎，這個基礎包括農業基礎、教育基礎以及工業化的體系基礎。沒有前面的基礎，後面的“先富後強”的轉型不可能實現。

二、從後發國家工業化的視角看中國近代史

當以英國為代表的“先進”國家以工業化的強大物質力量為基礎不斷向外擴張時，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和“遊戲規則”被塑造出來。這種世界秩序的變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舊不再可能。對於所有的後來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種嚴酷的邏輯：要麼自身實現工業化，主動爭取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相對較好的位置；要麼放棄工業化的目標，將本國命運的寄託于先進國家的“善意”。對於這種嚴酷的邏輯，所有的抱怨和憤恨都是蒼白無力的。同時，對於後來者而言，由於先進國家的工業化優勢已經徹底改變原有的世界秩序，這使得原生性的“自發工業化”歷程就不再具有重複的可能性，自此以後，所有的工業化都必須是“自覺的工業化”。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理解，也要從這種工業化不可抵擋的現實性的客觀角度加以理解。所謂“古今中西之辯”等觀念意義上的爭論，最終都必須依附於這個主線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務是重建能夠引領國家完成工業化的政權

近代的起點是清王朝的衰敗。即使沒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經進入了王朝衰敗期。中國的王朝沒有超過300年的。一般來說前100到120年是上升時期，後100年是下降時期。清朝的盛極而衰大概可以說以白蓮教起義為開端。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走上了盛極而衰的過程。西方的入侵是延緩還是加速了它的衰敗，不知道。總得來說，清王朝是因為衰老失血老邁而亡。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整個財政已經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後上臺的執政者都沒有錢，都靠出賣主權來換錢。袁世凱、北洋政府就是這樣的，一直到蔣介石。

工業革命我們可以講是洋務運動啟動的，但當時國家不可能承擔起實現工業化的任務。王朝衰敗以後，最大的任務是重建國家的統一。這不是一般的國家統一，這個統一國家的任務是要實現工業化。不是像明朝那樣完成驅除韃虜、建立大明，通過軍事革命建設政權那麼簡單的——這樣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現在這場革命，不僅要重建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還要滿足工業化建設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一百年的中心任務是重建引領這個國家完成工業化

的國家政權。

在半殖民地條件下，在這樣一種積貧積弱的條件下，無法完成工業化。印度也有過爭論。最後基本認定通過殖民政府完成工業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須獨立。國家政權的獨立、版圖的統一，是大規模工業化的先決條件。

新中國成立之前，沒有這個條件。直到1944年，中國基本上還是個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國家，現代因素占整個經濟的不超過10%，而且這10%還大量掌握在外資手裏。從經濟角度來講，作為傳統農業國，中國是小農經濟，手工業為主體，沒有辦法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因而，從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間，中心任務是重建統一的國家。袁世凱沒有能力，失敗了。國民黨因為無力抗擊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國內政治也沒有統一，也失敗了。

在中國思想界，現代化和西方化開始是混雜在一起的。因為工業化是發展於西方的，所以最早是“西方化”這個詞，後來才引入了“現代化”。比如 1929年，胡適在一篇論文裏面提到這兩個詞還是在同等意義上使用。1934年，上海《申報》發起了關於現代化和西方化的討論，在當時大部分人還以為西方化就是現代化的時候，提出廢棄西方化，採用現代化。對於這件事情，馮友蘭在他的《貞元六書》裏面有記載。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有一章專門區分現代化和西方化。現代化是指標，與工業化、城市化有關，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醫療水平提高、人均壽命提高等表現；而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沒有、而為西方獨有的，例如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藝復興、個人主義、社會大於國家等等觀念。但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個人主義等，是不是西方獨有的？還是隨著工業化與市場化而必然到來的？它是工業化與市場化的副產品，還是西方獨有的？我傾向於認為它是工業化的副產品。從這三十年的發展可以看的很清楚。比如很多社會組織，也沒有共產黨的批准，它就起來了。

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這要到1935年，蔣介石提出了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才確定下來；抗戰中才逐漸明確在工業化中應該以重工業為主。也就是說，在1935年後國民黨才逐漸明確，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而且與技術和教育有關，可以通過西方化逐步地實現現代化。共產黨第一次提出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裏。建國後這一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

從這條線索來看，近代思想中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牢牢把握工業化

的主線索。國民黨內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太晚，也總搖擺；或者說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太早，國民黨沒有做好準備。1930年代初，蔣介石在解決了各派軍閥後開始“圍剿”，1935-1936，全國範圍內還比較安定，又是豐收年。恰恰在這個時候，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漲。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這時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由之前的批評國民黨轉變為向國民黨靠攏。當時，成立了資源委員會，蔣廷黻、翁文灝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這個委員會其實就相當於國防委員會，全國的資源都被吸納在裏面，當時準備做各種資源、礦產的勘探，也吸納了大量留學、懂技術的知識分子進來，為抗戰效勞。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不能和日本打。國民黨推動工業化的意志並不堅定。

因而，近代以來，我們雖然提出過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工業救國，但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糾纏在政體裏，更長期地糾纏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中，一代最聰明的頭腦糾纏在軟塌塌的概念中。理論是混亂的，但情緒是清晰的。一個驕傲的民族把自己的歷史文化看得一錢不值。這個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沒有自尊心的話，自信心在哪？一個一無是處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學習？反過來講，若背負了傳統太多的包袱，又該如何向西方學習？這兩種情緒都沒錯，但辯論的方式是糾纏于“文化”概念——據說當時有一百多個類似概念。這些概念是能討論清楚的麼？

（二）如何理解百年激進思潮

1949年後，我們首先要實現的目標仍然是百年中國夢的追趕——有一個典型的詞叫做“迎頭趕上”。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就是要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批判“大躍進”很容易，但必須認識到，這種激進思潮不是毛澤東獨有的，可以說這種激進思潮是貫穿中國整個近代的。毛澤東提出要“超英趕美”需要十五年，後來縮短到十年，參加了莫斯科的會議後說只需要兩三年。這種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個人的。康有為在《日本政變考》的序裏說：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實行君主立憲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觀，八年十年可與列強並駕齊驅。這也是“十年論”。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說：十年之內建成10萬英里（約合16萬公里）的鐵路。現在中國的鐵路才9萬多公里，解放戰爭後留給我們的鐵路也只有2.8萬公里，其中有一多半還是俄國、日本在東北建造的。孫中山對中國工業化考慮之簡單讓人唏噓。1913年議會民主制框架下的國會選舉中國國民黨大勝，宋教仁當時也說要在三五年內可以與列強並駕齊驅。

我們現在可以說，近代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任務的繁重性與複雜

性，歷代的政治思想家與領導人對此都缺乏充分認知，都把迎頭趕上的時間縮得太短。但不要以為這是歷史中的力量，是先賢的錯誤認識，如今還不是這樣麼？我們這個民族很焦慮地等待新的產業部門出現，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這個動力就在於我們錯過了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革命，現在新能源等出現了，我們要一步趕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急迫。這個現象是需要解釋的。我的解釋是：第一，中國人確實曾經非常闊氣，我們一講就是三千年文明。這是高度的驕傲、自負。對華夏絕對有信心。這種心理早在周秦以來就建立起來。第二，這個驕傲還被牢牢地記住。所以近代落後、積貧積弱所積攢的氣，比所有民族國家都強，激起了迎頭趕上的氛圍。我認為，“迎頭趕上”的思想是中國後來所有激進思潮的總根源。而每次激進主義的預期失敗，並沒有平息這股思潮，反而是認為前面的人還不夠激進，後面的還要更激進、更徹底。

當然，在百年激進中，不是沒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堅持以農立國，排斥大工業的。在中國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這一派有很大的市場，比如甘地。甘地的整個建國思路和尼赫魯不一樣（如果甘地在世時間更長一些，印度的工業化就會更曲折）。《甘地自傳》裏講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紡織廠主的辯論。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個英國的工業化就把全世界攪擾得不太平，為什麼還要那麼多的工業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國家都有這種保守思潮。我們現在不要認為它是徹底保守主義就批判它，它在當時是有根據的——因為它考慮的是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狀態。如果走向現代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怎麼安排？甘地看到這個問題，因而鼓吹家庭紡織業。這就是他的經典形象。當然他這麼做也考慮了印度的物質條件：因為印度比較熱，對於紡織品的需求比較簡單。甘地鼓吹家家有紡織機，自己解決穿衣問題。從印度當時的生活來說，從暫時的情況來說，是有道理的；但是長遠來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設想發展，在西方已經工業化、已經軍事現代化的條件下，即使印度獨立了，能夠改變當時挨打的命運麼？如果所有非西方國家如果不走軍事工業化的道路，它能維持自己民族的獨立嗎？能改變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嗎？印度是這樣，中國這個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國家也是這樣。

在中國，選擇這樣一條保守的工業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點沒有，當時研究工業化的人物吳景超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就這麼設想過。這本書出版於1937年，他認為從農業國到工業國也沒有問

題，解救農村之路在於“都市工業化”，剩餘勞動力進城打工，緩解農村勞動力和土地壓力。但盧溝橋事變以後，他就改變了思路，明確意識到中國的工業化一定是重工業優先、軍事工業優先。此後，他到德國、蘇聯考察，更加確定。保守的工業化道路在現實面前，也讓位于激進思潮。

毛澤東說“大躍進”不是他的發明而是孫中山的發明，這是有道理的。“迎頭趕上”這個詞是孫中山創造的。最早出現在1905年同盟會創立後孫中山辦的《民報》上。1905年後，在《民報》與保皇派創辦的《新民叢報》兩份報紙上，開展了關於革命還是改良、共和還是立憲的辯論，形成了各自的理論。保皇派的理論是進化論，先從君主專制，再到君主立憲，最後到民主共和，這是不能逾越的。孫中山為了批這個進化論，提出“迎頭趕上”。他當然也認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過他不同意進化論：你跟在人家後面是不能趕上的，要迎頭才能趕上。

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孫中山認識到搞軍事工業、搞器具不是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政體才是核心；但當時中國已經沒有時間思考西方政體的歷史發展脈絡，也來不及去思考有著自身豐富經驗的中國政治應該如何與之對接，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強就會被瓜分，要富強就要改變政體。因而，我們是在面臨被瓜分的緊急情況面前，要引進更好的政體。在政體上有兩個爭論：一是君主立憲好還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沒了，君主立憲派自動就敗了——一種理論不是在辯論中被駁倒的，它是在強大的歷史現實前失敗的。如果當時皇帝和西太后都還在世呢？我估計清王朝要崩潰就不是那麼容易的。平心而論，清朝的幾百年統治人民大體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愛民，直接的農業稅一直沒有增加。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西方打敗仗賠款，它寧願賣官也不願意加農業稅。

我很贊同孫中山的判斷，不迎頭趕上是不能趕上的。因為中國積貧積弱，元氣還沒有恢復，你跟在別人後面跑，要跑的比前面的人還快，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別人在前面跑會犯錯誤走彎路，那我們可改彎取直。所以迎頭趕上要等待別人犯錯誤的那一次。但即使你這樣趕上了，別人趕上你也容易的。“迎頭趕上”帶來的悖論很明顯——西方強所以跑得快，我們弱所以跑得慢；現在跑得慢的人要跑得比跑得快的人還要快，這是個悖論。這確實是我們近代的一個重大的悖論。這兩個判斷同時為真又恰好相反，是辯證的。如果說一個判斷100%真，另一個判斷100%錯誤，那思想的選擇就太容易了。在一個民族發展的一個階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當兩個對立的判斷都構成一個真

理，這個民族就陷入了漩渦中。漸進論、進化論有它的道理，“迎頭趕上論”也有它的道理。只不過在激進的民族心理中，迎頭趕上成為主流。迎頭趕上論、跨越式發展論、超常規論，都是一個意思。三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一個大躍進，只是它的後果沒有原來那麼嚴重。這可以說是一次接近成功的大躍進。

（三）社會主義平等也是內在的訴求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主導最極端的形式就是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它同時要完成兩個歷史使命：一個是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實現社會主義平等、消滅階級。而這兩個任務實際上是有矛盾的。

工業化既需要實現產業資本積累來實現擴大再生產，也需要對生產流程的監控來保證工業品的治理和提高生產環節的效率。要實現資本管理和生產流程監控，客觀上需要大量的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職員。而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資源的存在，又必然反過來強化一個企業內部的等級制結構，就像“泰羅制”所揭示的那樣，這是由現代大工業生產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隨著工業化的深化，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資源無疑會不斷擴大，不僅進一步加深企業內部的等級制結構，也在社會結構帶來階級不平等的“復活”。

這兩個任務現在看來絕不是毛澤東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澤東在1958年用大躍進來解決第一個問題，用文化革命來解決第二個問題，可以說都失敗了。但這兩個問題都是真實的，都緣起於中國的近代。工業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們一直把孫中山看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其實他哪里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哪里有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害怕資產階級革命的後果？他害怕什麼？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他提倡節制資本，即擴大國有資本在經濟上有主導地位。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西方勞資階級的衝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看到了西方是強而富的，但是貧富分化卻極為嚴重。一戰以後，這個震撼就更為普遍了。避免中國走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是某種基本共識——只不過在不同的知識分子那裏社會主義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麼說，社會主義是個“好詞”，是要避免工業化帶來的嚴重的貧富分化。

承認西方的強和富但是拒絕西方的貧富分化的第一人，還是嚴復。嚴復最激進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義與啟蒙的基本立論。嚴復認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強之

根，但是與此同時，他就已經看到西方強則強矣、富則富矣，貧富分化嚴重（《原強》）。這也為他最後轉為儒家埋下了伏筆。他認為在儒家的“三世論”裏，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裏面有幾條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條是“家給人足”。儒家的社會理想沒有那麼高，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條是“貧富不相懸殊”。古人講如果貧富相差十倍則相順，“百倍相僕，千倍相奴”。貧富懸殊會引起社會地位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孔子講“不患寡而患不均”，講的就是有差別但不能太懸殊，以至於富者可以凌辱貧者。第三條是“刑措不用”。這是比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監獄但不用。第四條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鋒”很多的意思。按這四條去看西方，西方並不理想。後兩條和前兩條是有關係的。家給人足、貧富不相懸殊，而後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當然，“倉廩實而知禮節”是儒家一種論述，儒家還有一種說法是“飽暖思淫欲”。改革開放告訴我們，“飽暖思淫欲”比“倉廩實而知禮節”更真實。古與今的最大文化差別（不論中外）是看到每個個體情感當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是要修身。而工業化以後，資本主義則強調個體，強調利益，認為欲望的實現就是滿足。它的優點是鼓舞人競爭，使得財富大量湧現，缺點是人與人關係的高度惡化，也帶來人與自然關係的惡化。嚴復後來非常強調教育，引進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後來逐步成為我們的教育目標。他認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體都是表面的、膚淺的。

近代的革命家與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分化都表現出相當的警惕情緒。對於中國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們一方面因為“開眼看世界”而擁有了較為廣闊的視野，瞭解進步與變革的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他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所奠定的知識基礎依然與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觀念層面依然堅持著中國知識精英一直追尋著的“大同理想”。

改革開放以後，在計劃向市場轉變的過程中，同時發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轉變。只要計劃向市場轉軌，所有權必然隨著市場的變動而變動。這點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場相比，我認為市場更具有決定性作用，所有權隨著市場的變動而變動。我們用三十年的經驗才知道市場的厲害——它的經濟效應、社會效應、文化效應、心理效應是無孔不入的。現在我們的國有企業，其實是國有資本。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是不一樣的。國有企業當中，勞動者和國有財產固定結合，廠長幾乎沒有資格解聘自己企業的勞動者；現在的國有企業則是以國有資本的形態存在，勞動者普遍雇傭化。在普遍雇傭化的市場中，人也成為商品，所謂“人力資本”。這個詞說的那麼直白又讓人反感。康德說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們只能妥協，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賣勞動力換取貨幣。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現在人利用自己勞動力不夠，還利用自己的器官與身體。在市場經濟面前，很多倫理顯得很無奈。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把歐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進”技術設備引入中國，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蘇聯技術和仿製蘇聯的技術，這樣使整個中國的裝備製造業技術水平提高了一個檔次。當然，依附在原来的計劃經濟工業體系下的工人階級，隨著設備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轉軌，整個生產方式也悄悄地轉型，帶來了分配方式的轉變，帶來了階級、階層的重新形成。這個在黨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經默認了。十五大文件中說的是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體分了許多要素，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個要素就是一個階級。資本要素就是資本家階級，技術和管理作為要素它是中產階級的來源，勞動作為要素就是勞動階級。這裏還有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勞動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結合而來的小農階級，他們的子弟轉化為農民工。農民工怎麼定義非常複雜。這裏面還沒有提土地要素和權力要素。如果將土地作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從來是一筆糊塗賬，其實這是貧富分化的重大來源之一。權力作為一種要素也參與分配。這裏指的是權力私用作為要素。不同的要素按要素獲得相應的報酬，就是一個階層。各個要素之間的力量配置使各個階級獲得的份額不同。社會主義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的平等，可以說這個希望落空了。

三、目前處於工業化道路的什麼位置？

中國目前處於什麼樣的位置？中央的判斷是——我們離我們的目標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近。我認為，至為關鍵的尖端技術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後二、三十年。技術分為尖端技術、先進技術、成熟技術和衰敗技術。這些都來源於西方。如果我們國家的技術水平永遠處於西方發達國家衰敗或者成熟技術的層面，那設備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國家的折舊，促使它投入高端技術研發的動力更強。目前，中國到了先進技術向尖端技術突破的時候。技術是買不到的，因此我們要獨立地自主創新，向尖端技術突破。這個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裝備業和材料工業。比如大飛機，是整個工業體系達到先進體系的標準。

現在令人憂慮的就是，在這個關鍵的追趕過程中，國內矛盾集聚；並

且，如何對這些矛盾做判斷，也是眾說紛紜。如果對這些矛盾的處理不恰當，會不會導致不可收拾的結局？如果現政權無力加以穩定，那麼我們趕不上、甚至衰敗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輕心。

在即將追趕上的這個階段，是最困難的。因為前有攔堵，後有追趕。勞動密集型產業隨時可能走投無路，這是“後追”；買不到先進技術，全面封鎖，這是“前堵”。在全面趕超過程中，前堵後追若不能突破的話，就是我理解的“中等收入”的陷阱。這一代人對這個形勢要有清醒的認識。

改革開放後解決了兩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是吃飯問題，第二大問題就是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現在看基本解決了（說是“基本”解決，是因為我們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學裏去）。但在城市化過程中，新的問題又在產生了。比如，如何安置兩億多的農民工？這個經驗在世界史上沒有先例可循。在發達國家早期，在後發國家如印度、南美等，都產生了大量貧民窟。中國要在不造成貧民窟的情況下，把農民工安置在城裏，使其有穩定就業、體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這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最為尖銳的問題。單說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來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農民工自己的學校裏，脫離了義務教育。2007年以後，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兩種辦法：一種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於當地的公辦學校中，另一種是財政資助那些收納外地孩子的民辦學校。當時這三、四十萬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萬的財政支撐。這個問題剛解決又產生了新問題：農民工子弟在公辦學校裏分不分班，分不分校？義務教育結束後，農民工子女能不能參加中考？如果允許參加中考的話，那也應該允許他們參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議，說這樣做的話外來人口就佔用太多本地人資源。如果不允許他們參與中考，他們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銜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來人口子女教育還有幼兒入託等問題。公辦的托兒所投入大、門檻高，於是“黑托”出現。這有辦法解決麼？其實，但凡勞動力導入的地方，就會有農民工為農民工自己建立起來的複雜的低端市場，囊括了食品、餐飲、旅館、教育、醫療、交通等方方面面。因為他們工資低，要降低消費標準，要把節省下來的錢來寄回家蓋房子或供養孩子。這個市場的特點就是價格之爭。當價格壓低到一定程度時，大量偽劣商品就充斥市場，而我們的工商標準是照搬西方的，標準太高；小的工商業主不可能登記，只能是運動式管理。新的問題層出不窮。

近幾年國家擴招後，又產生700萬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理論上這些畢業生應進入中等收入階層，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職位還沒有那

麼充分。在市場經濟下，要想擴大中間階層，第一要實現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向中高端轉換，這是產生中產階級職業的先決條件。第二是政治意願。

現在提出的中心任務是“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對此我有兩個判斷：第一個判斷，能不能完成創新與轉型，就是能不能正常崛起、與西方並駕齊驅的關鍵；第二個判斷，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趕，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二百年東西方歷史的敘事要被改寫。真的到這麼一天，改寫是需要語言的。我們要隨時為這種語言做準備。如果從自然科學來看，要做好的是替代技術，尤其是進口替代尖端技術的突破。那麼對於從事文科研究的人來說，在這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話語”。

中國知識界對這個歷史時刻沒有準備，西方知識界反而起了變化，比如說溝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國的公與私》、《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等，其實是寫給日本人看的。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對中國是俯視的。但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知識分子不再仰視日本，而變為平視、甚至俯視，很多時候還把日本當作教訓，因為1990年以後日本的經濟就趴著不動了。現在我們對日本不是仰視，是俯視。日本對我們也是俯視。這兩個俯視誰對？溝口雄三看中國發展的這幾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觀點看問題，而要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第二，要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國為標準。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是以中國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的。什麼時候以中國為方法，至今沒有答案。所以我們要討論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是討論不下去的，因為要討論中國道路，已經有既定的方法在那裏、有既定的標準在那裏。用既定的方法與標準是無法討論新事物的。此外如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為中心，以中國為中心來考察中國整個的近代運動，尤其是當代三十年。另外一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國》中同樣提出這個問題。德國前任駐華大使賽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也對方法論提出批評：西方人以西方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標準看中國屢屢出錯，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價。

因而，我們必須要以中國為方法，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放在六十年的發展脈絡中，把六十年放在整個近代史當中，放在整個的歷史長河中來考察。這種思維方式是有效的。可惜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缺乏這種自信，他們依然陷在五四之後的模式中，以西方為標準、以中國為衡量對象。什麼時候可以以西方為參考、以中國為標準，更準確地觀察中國事物？我認為這是年輕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

年輕一代的呼籲。